

大家

百草和文章

□ 张 炜

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会发现，一些大文人同时往往也是好医生，或者是对医学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；有的虽非专业行医人士，却道出了医家未能道出的玄机。曹雪芹是一例，苏东坡也是一例。类似的例子太多了。苏东坡有过一句常被医家引用的名言，叫“大实若虚”。反过来观察那些有名的大医家，差不多个个都有坚实的文字功底，他们的医学著述，特别是留下的医案，其描述真是生动透彻到令人拍案的地步。文人有时忍不住要给人讲一点药方，或医家忍不住要铺展一番辞藻，都是因为二者内里相通的缘故。

识得百草即成医家，百草生情即变文人。形象思维的生动，辩证思想的精密，都是好文章才有的属性。有些文学家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中不但给自己治病，还给一家老少开方，结果也会留下一些手误；除非有了难缠的疾患，有的文人雅士是不找医生的。也有文章高手与医家是密不可分的朋友，他们交往密切，互通有无。像一些出家人、居士，常常也是探究钻研医术和养生的高手。那种清寂的生活既有利于养生，也有利于思辨，于是就出了文章，也出了草药方剂。苏东坡自己琢磨出的药方不少，烹调的窍门也有一些，与一

些官场朋友来往唱和，应酬中也时有处方互相赠予。一些和尚道士赠给苏东坡的验方，被他当成了最宝贵最慷慨的赋予。

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，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。治世与治病的原理，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。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着同一种道理。写一篇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，词汇即众生，结构即组织形式。阴阳关系，辨证施治，这些医家的基本理解方式，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方法。一篇文章的完成，需要面临无数次的判断和斟酌，作者的器局见识都反映在其中了。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复杂情形，人的治理也面临着类似的决断和思索，都需要相当严密的运思，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。在传统文化中，中医、文人、官吏，这三者的身份虽然有时是统一的，有时是分开的，但内在的一致性却是从未变过的。

文章有起承转合，有逻辑的周密，有文气文采，这些都恰恰像医家手中的百草调剂。传统文章不是今天学来的西文格式，没有那样的洋八股的腔调，好文章与大天气脉总是息息相通的。现在的一些文论，即便是谈论论艺的，也满是机械化学的气味，是现代工业的说明书性质，没有

生命的肌理脉动，也没有人性的温热。像古人的以诗论诗，品味和欣赏，中医把脉式的思辨和感知，现在已经极其罕见了。

好中医的缺失与好文章的缺失，在步调上其实是一致的。如同医家表面上的深刻化和逻辑化，实际倒是一种简单和粗陋；至于一些手术器械的强求和使用，对于文章的肌理只能造成破坏和割伤。中医对于卫气营气、任督二脉的理解，运用到文章里也是一样。现在的时髦文章则完全不讲文气，只想学点西方的理论皮毛，搞出一套机械的肤浅的临床论证之类。

古代文人喜欢丹丸的故事很多。除了一些人的贪求长生饥不择食，吃了一些急进的丹丸发生了不测之外，许多人都是顺应天然。他们很能炮制一些滋补的吃物，这其中也包括秘不示人的丹丸。炼丹曾经在魏晋时期成为部分文人的时尚，以致有人因为热衷于此而耽搁了诗文。大诗人李白是一个求仙心切的人，其丰富和趣味非常人所能比拟。他对一些金石丹丸专家、一些道士的迷恋，在行踪之间处处透露，也屡屡被诗章记录下来。“一鹤东飞过沧海，放心散漫知何在。仙人浩歌望我来，应攀玉树长相待。尧舜之事不足惊，自馀嚣器直可轻。巨鳌莫戴三山去，我欲蓬莱

顶上行。”另有一诗说：“海客谈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”“青冥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。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下来。虎鼓瑟兮鸾回车，仙之人兮列如麻”。可见他对东海里的三仙山、对于神仙多么向往。这种追求仙境与寻觅仙药的心情都是一回事，所以才有一个叫徐福的人率船出海，求的就是长生不老之药。李白也挂记着徐福。

有些文人吃过了丹丸，按要求披头散发在花草树木间行走，说为了使丹丸发散。这种情形多么有趣。食丹的人并非因为生病，而是依据中医“治于未病”的原理，追求超强的体魄。个别误食了丹丸的人在地上滚动，那是体内的丹丸热力烧灼起来。巨大的化学能量把他们几近摧毁，会给他们一个教训。但最终他们仍然还是迷恋于炼丹，因为那时还未能分清百草组合的美妙与金石冶炼的区别，在不知不觉中将中西医结合了一下，结果化学变化发生了：一股陌生的力量将人击倒在地。

总之中医与文章难分难解。在有的人那儿，可以说是医随文生，文助医传，二者之间互为襄助。可以设想近代文事的繁荣与传统医术的复兴，或许该走一条统一的轨道，因为它们的思路看来十分近似。

前尘轶话

林徽因的遗札

□ 韩石山

今为实际生活所需,如不得已而接受此项实利,则最紧要之条件,是必需让我担负工作,不能由思成代劳顶替。

与思成细商之后决定,用我自己工作到一半的旧稿,用我驾轻就熟之题材,用半年可完之体裁,限制每日工作之时间,作图解及翻检笨重书籍时,由思成帮忙,则接受,不然,仍以卖物为较好之出路,少一良心问题。

这是林徽因给傅斯年的一封信,不全,无上下款。查梁从诫编的两卷本《林徽因文集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),陈学勇编的三卷本《林徽因文存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),均未收入。时下出版的多种《林徽因传》亦未提及。说是一通遗札,当无大谬。

此信见于2011年印制发行的三卷本《傅斯年遗札》(第三卷)第1273页。系傅斯年给朱家骅、杭立武信中所引录。

抗战期间,傅斯年有一项义举,如今已广为人知,也广为人所称道。这便是,1942年4月18日致信朱家骅,希望朱能与陈布雷相商,由陈便中向蒋介石进言,特批一笔款项接济梁思成、梁思永兄弟。同日也写信给与陈布雷关系更深层的翁文灏。后来还是翁文灏这边起了作用。同年9月底,蒋介石批下两万元款项,翁接到后即转傅斯年。《翁文灏日记》中有此记载。央视播出的多集《梁思成林徽因》中,有傅斯年领款的收据。

还要补充一笔的是,傅斯年这次请求救济,名义上是为梁思成、梁思永兄弟两人,实际上应该说为梁思成、梁思永两个家庭。两家的情况又有所不同,不同在于两家虽都是因病致贫,但病的主体有明显的差异。梁思永家,是丈夫梁思永病重,而梁思成家,是妻子林徽因病重。还有一个不同是,梁思永是专职研究员,梁思成只是个兼任研究员(每月有补助款)。说到这儿,不妨将话挑明,这次请求救济更侧重在梁思成,而梁思成这边,林徽因又占了更多的分量。此事我有专文论述,读者朋友权且相信。这并不是说他拿梁思永做了幌子,不是的,是他要接济梁思永自有办法。他自己就掌握着一大笔经费,不必费这么大的力气,担这么大的风险。

傅斯年这次给朱家骅、杭立武的信,可说是前一义举的后续行为,也可说是另一义举。宗旨是,本其既有之思路,为林徽因的经济状况,谋一彻底之解决。

前信写于1942年4月18日,此信写1942年于5月5日,相距不过十几天。以此推测,或许是傅氏觉得直接请求拨款难度太大,不可凭恃,或者是觉得纵然答应了,也不妨再为林徽因谋一更为圆满的济贫办法。

这个办法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为林徽因安排个工作,每月有固定薪饷。

当年中国有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,管理着一大笔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余额,还有个中英庚款董事会,管理着一大笔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余额,杭立武就是这个董事会的总干事。前面说傅斯年呈请蒋介石拨款救济二梁兄弟,分别致信朱家骅和翁文灏,后来是翁这边起了作用,言下之意,朱那边没有动静。显然不是这么回事,只能说两人办事风格不同,路径不同。极有可能,朱觉得让蒋介石拨款的可能性不大,或者操作起来难度大些,还不如自己想办法。他的办法便是,请杭立武在英国的庚款基金里设个名目,给二梁以切实的帮助。看这封信的开头部分,朱杭二人已有个办法,专门用来帮助梁思成家家庭,但傅斯年认为不尽妥善,于是提出他的一个办法。

这就要细说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了。分为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先立个前提与标准,第二部分说林徽因完全符合这个前提和标准。

第一部分说,贵基金会过去也办理“科学研究补助”的事,后来局势变动,遂成兼职,不免有许多弊病,他曾主张竭力整顿。五十年来,中国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文学者,总数不会超过一二百人,基金会的补助,应当重点放在他们身上。若能这样,就是旧办法有所改变,“转为得要,但看人选之如何耳”。像近期对陈寅恪的补助,就是最为恰当的,“故可佩也”。又怕给朱杭二人造成拿林徽因比陈寅恪的印象,赶紧补上一句:“弟详言此意,不为徽因嫂一人事而发,似可为贵会方针之一也。”

第二部分就“图穷匕见”了。大概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项目,是以著书为立项依凭,杭立武问过林是否有著书的意向,身体状况又如何,傅信一起首便说:“事实上徽因嫂旧有《中国之建筑》一篇,将过半矣。彼在病中初末间断各事,如写文艺作品之类,如尽令他事,专成此稿,事既可行,转于病有益。”接下来,正好今天徽因嫂来一信,即上引之信,意在可看出林的心志与品格。且说,他将杭立武信上所开列的补助人员名单看过,觉得林徽因受补助一事,当前在列。

与此信同时,傅斯年将林徽因的研究计划、他与李济的推荐书,一并奉上。

他与李济的推荐书,也是一封给朱家骅与杭立武的信。信中提到对林徽因的具体安排。所在机构为营造学社,指导人为刘敦桢(士能),每月待遇:“准以林女士以往之资历成绩,在国内实为美术史与建筑学之地位,拟请给以最高之待遇,即立武先生近示一般办法中三百八十元之数。”起薪时间:“因弟等久劝其屏除其他工作,完成旧稿。彼自上月已开始,似可由四月份或五月份支给。”

这第二部分,有没有夸饰不实之词,就不必深究了。成人不光在行为上,也须在言辞上。几十年后,我们看到的只有一种纯正的感情、深厚的责任。再就是,此人有一“傅大炮”的绰号,更让人感到亲切可敬。

从《傅斯年遗札》后来披露的信息看,此事没有办成。

谈数

回得去的故乡

□ 韩浩月

诗人曾说,“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”,故乡无疑是一个人最了解不过的地方了,但是,在离乡二十余年后,我反倒觉得,故乡到处都是景色。

这几年,每逢假期,催促我回乡的,是我12岁的女儿,她喜欢老家的美食,也喜欢我带着她,在老家的矮山上、栗子林里、沿河公园中散步,去认识一些茂盛的树木与花草,去见她老爸的亲戚朋友,去县城电影院看一场电影……老家的生活,节奏很缓慢,或许她是喜欢上了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。

对我而言,所谓的“乡愁”,已经淡化了许多。有人曾说,“所谓乡愁,就是你离开了某个地方之后会不停地想念它”,这算是对于乡愁最通俗易懂的解释了。我倒不是因为“想念”才回故乡,而是觉得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动作,有了较长的空闲时间,就愿意回老家生活一段日子。当这样的日子变多了,乡愁自然也就淡了。

关于乡愁,我在不同的年龄段,有过不同的认识,前不久和朋友聊天,再次谈到乡愁话题,忍不住脱口而出一句话,

“这几年脸皮变厚了,有事没事总往老家跑”。说完之后,把自己吓了一跳,家乡是自己的家乡,应该是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,和脸皮厚薄有什么关系?

回忆起来,还真有关系。记得二十多年前离开家乡的时候,其实内心是犹犹豫豫不想走的,但一轮轮的送行喝喝,箭在弦上不得不发,不想走就有点耍赖皮的意思了。家乡人希望你走,是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前程,但对于游子来说,走可以,但回来时必须得带着点成绩,否则,就显得有点辜负了家乡父老。

年轻时不懂人生,曾经好几年除了春节之外,别的时间不愿意回家乡。不敢回的原因很简单,还是出于一种“未曾衣锦,不敢还乡”的顾虑。现在想想,多傻啊,那么古老的传统,那么陈旧的观念,你要是太过重视,就是给自己戴上纸枷锁了。真正的亲人和朋友,不会在乎你在外面混得好不好,人返家如鸟归巢,天经地义。

三十来岁,思想尚不成熟,返乡时偶尔陷入复杂混乱的情绪当中。在痛苦中左冲右突,终于摸索出了一个简单的办

法——把自己当成家乡的游客,放假的时候回家乡住几天,随便逛随便吃,吃好玩好了拍拍屁股走人。依靠这一策略,我开心地混了好几年,虽然未免感觉有些自私,但也算一种自洽。不少人就是没有找到这种自洽方法,想回家乡而不能。

四十不惑,具体体现在处理家乡关系时,就是变得“厚脸皮了”,不再在意外界零星的评价。再说时代变了,家乡人的居住形式变得零散,人际关系相较以前也显得更舒服一些,没几个人在意你姓甚名谁。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变了,对家乡曾经失去的认同感,又一点一滴地积蓄在心里,“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,异乡就更不能”,当我写下这样的句子,我知道,我已经与故乡彻底和解。

“家乡的味道在味蕾之上”,不少人都喜欢用这句话形容家乡,我也不例外,每逢还乡胖五斤,回老家,吃得好吃得美,成为最大的诱惑。但近几年变了,在对家乡美食依然热爱之余,开始有了愧疚,这种愧疚感的主要来源,一是觉得自己没能对家乡作点儿贡献,二是对家乡的文化没有足够的了解,这么多年,自己一

直浮漂于家乡之上。

所以,这几年,回家乡后做的最多的事情,就是遍游家乡的每一个角落,尤其是对产生过典故,古代名人留下过痕迹的地方,总是要多盘桓一会。也喜欢上了与家乡传统文化研究者长时间地聊天,更多地了解家乡的历史。走得越多,聊得越多,心里越安静,也觉得重新拥有了孩童时对家乡的单纯情感。

我不再认为“故乡是回不去的”这个说法。一个回得去的家乡永远在那里。尽管家乡在变,游子在变,但两者之间风管与线、水滴与河流之间的关系,永远不会变。风筝想要回到放飞者的手里,水滴想要重归母亲河,这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。

当然,人与家乡的关系,是处在变化当中的。一直在家乡居住的人,和一直在外漂泊的人,也会对家乡产生迥异的认识。从简单到复杂,从复杂到简单,时光流逝,游子对家乡的普遍情感如日落和日出,在起伏之间,也有久远而恒定,终有一天,我们都会重新成为家乡的赤子。

冈仁波齐的星空

□ 丁厚勤

都行,总以为西部有我要寻找的东西。

一天,我接到大新电话,他激动地跟我说他与阿里公安处签了,也已经跟家里说。或许他并没有得到家里的支持,他语气有些慌乱,说从今天开始要戒烟,跑步,希望能适应高原环境。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,我得请你喝个酒送个行。但我再联系他时,他已经离开西安。

大新刚到阿里的时候,我们曾通过一封信,寄信与收信的时间间隔大概有两个多月。他写了五六页,兴奋地说着对当地什么都很习惯。这是我们唯一一次通信,此后数年再没有联系。有两年春节回老家,我听说他也在家,想去找他见个面,却总是因各种原因错过。

两年前的冬天,我去西藏,大新很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在拉萨住了四天,他每天带我去吃饭,晚饭后就在拉萨街头散步聊天,他跟我讲起在西藏二十余年的经历。

大新去西藏之前做足了思想准备,他想到阿里交通和信息都是闭塞的,于是带去两箱子书籍期刊,有历史人文方面的教材,有他喜欢的体育杂志,还有一些古籍经典。

现实比他想象的还要残酷。阿里地区空气稀薄、人烟稀少,落后、贫瘠、空旷。他很快被派到普兰县一个叫塔尔钦的村子,这里海拔4600多

米,高寒缺氧,生活条件极为艰苦。

塔尔钦地处神山冈仁波齐脚下,圣湖玛旁雍错北岸,是藏区宗教转山和转湖活动的起点。大新是这里唯一的汉民,也是唯一的外事警察。当时国内游客很少到这个中印尼三国交界的偏远地方来,却常有外国的探险者前来,大新的工作就是对外国游客进行管理。

20岁的小伙子,正是年轻气盛、精力充沛的时候。一个人,两把枪、一间小屋,大新度过边境上一个个漫长的日夜。空余的时间,孤独像整个旷野笼罩过来,无边无际,密不透风。他感觉像冻僵的手指泡在热水里,疼痛难忍,且无处可说。

生活里没有人情往来,就有了大把的时间。大新一头钻进他带来的书籍里,疯狂地阅读。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偏好,大新在大学里就喜欢历史、宗教、哲学、古籍经典,他开始潜心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,《资本论》《共产党宣言》等,一句句、一本本地读,越读越沉浸,越读越兴奋。

大新从小在山东长大,在西安上大学,习惯了车水马龙、灯火辉煌,脑子有了一些知识和想法;而他眼前是原始的自然,落后的社会,没有可以自在畅谈的人,没有广播电视,更没有网络,只有高高的雪山和无边的风。他两只脚踏进不同的河流,一条是发达的,一条是落后的,在这种情况下,更让他

从马列主义专著中读到历史、当下和未来。

在那样一个闭塞的环境里,马列主义著作将他带进一个无边的世界。他开始思考,为什么身处东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那么大,而阿里的人们却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持淳朴,反而没有那么多愤怒?很多类似的问题,他都在马列主义著作中找到答案。

冈仁波齐的夜晚黑得纯粹,夜幕中繁星耀眼,星星直接撒到地平线。在这样安静的夜晚,当他打开书与先圣先贤对话,就会感觉到思想的碰撞、文化的碰撞如此美妙,如此引人入胜。每当读到兴奋处,大新就推门出屋,一个人仰望浩瀚星空。此刻的他孤独又充实,渺小又高大,他觉得人性是相通的,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。

大新在塔尔钦度过了5年的时光,他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马列主义著作里。后来他被调回阿里,几年后又被调到拉萨,他再没有回过阿里的塔尔钦,而那段时光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。他说,看到根本、掌握规律,一切都变得简单。马列主义教会他的更多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,让他在此后的日子里变得坚定从容,心胸开阔。

我期待有机会再去西藏,与大新一起去阿里,感受塔尔钦的静夜,仰望冈仁波齐的星空,听他讲述一个山东青年的读书时光。